



(一)

1933年的天津，夏日的阳光像融化的黄油一样，涂抹在租界的红砖墙上。六岁的特伦布莱·麦肯锡站在甲板上，紧紧攥着父亲米歇尔·麦肯锡的衣角，蓝眼睛瞪得溜圆。港口上的人群像蚂蚁一样蠕动，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小贩的吆喝声、苦力的号子声、汽车的喇叭声，还有他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

“爸爸，他们在说什么？”特伦布莱仰起头，金黄的卷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是中文，孩子，很快你也会说的。”米歇尔蹲下身，与儿子平视，眼里满是自信。

米歇尔·麦肯锡是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医生。两年前他来到天津，在法租界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兼诊所。现在，他终于有能力把儿子从多伦多接来了。

特伦布莱的第一幅中国画，是在抵达天津的第三天完成的。那天早晨，他趴在教堂二楼的窗台上，看着街对面的早点摊。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老人正在炸油条，那短短的、小小的面疙瘩，抻长放下去不一会儿就变成金黄色，迅速膨胀，像变魔术一样。好奇的特伦布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和铅笔，飞快地勾勒了起来。

“这是什么？”米歇尔晚上回到家中，发现儿子的床头贴着一张纸。

“油条，爷爷给了我一根，很好吃，脆脆的，香香的，比面包还好吃。”特伦布莱嘴角留香地说道。

米歇尔惊讶地看着这幅画，虽然线条稚嫩，但老人佝偻的背影、油锅上升腾的热气，甚至油条在油中翻动的动态感都被捕捉到了。这不是普通六岁孩子能画出来的，他觉得儿子有绘画的天赋与潜力。

从那天起，特伦布莱的绘画天赋，像春天的竹笋一样迅速生长。教堂里的中国信徒们，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安静画画的外国小男孩，常常给他当模特。特伦布莱画抱着婴儿的妇女、画修补鞋子的匠人、画卖糖葫芦的小贩……他用简单的线条捕捉人物的神态，往往几笔就能抓住特点，让人物跃然纸上。

1935年春天，米歇尔为儿子请了一位油画老师——英国商人理查德·伯顿，一位业余画家。伯顿第一次看到特伦布莱的速写本时，惊讶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上帝啊，这孩子是绘画神童！”伯顿翻着那些画满市井百态的纸张，“看这线条，这构图感！米歇尔，你必须好好培养他。”

伯顿开始教特伦布莱素描和写生基础，但坚持要他先掌握扎实的速写技巧。“油画的基础是写生，是速写，是素描，你无师自通，有点基础，再跟我好好学临摹，基础打扎实了，再上手油画。”伯顿用烟斗指点着说。

特伦布莱进步神速。到了1936年，九岁的他已经能用炭笔熟练地表现光影和质感。他的速写本堆满了小书桌的抽屉，每一幅都标注了日期和地点。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河边的码头，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和繁忙的景象。

语言方面，特伦布莱同样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学会了天津方言中的许多俚语。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夏天被彻底打破。

(二)

7月底的一个清晨，伯顿先生匆匆来到教堂，脸色苍白：“日本人进攻了，他们在卢沟桥挑起了事端，战争爆发了。”他气喘吁吁地说着，脸上写满忧虑。

米歇尔皱起眉头，作为医生和传教士，他比普通人更清楚局势的严峻：“理查德，你有什么打算吗？”

伯顿先生摇摇头：“我订了下周的船票。米歇尔，日本兵的残忍你应该有所耳闻，你也该考虑离开这是非之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特伦布莱躲在门后听着大人们的谈话，不明白为什么伯顿先生要离开。那天下午，他照

常背着帆布包出门写生，却发现街道上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人们行色匆匆，商店早早关门，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喊着：“号外！号外……”

他走到往常写生的公园，发现那里已经驻扎了军队——但不是中国军队。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在公园里架起了机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特伦布莱本能地掏出速写本，躲在树后画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大步走过来。

特伦布莱抬起头，蓝眼睛直视着对方。日本兵看到的是个外国孩子，态度缓和了些：“美国人？”

特伦布莱用中文回答：“我是加拿大人。”

日本兵似乎放松了警惕，摆摆手让他离开。特伦布莱快步走开，但没忘记把刚才的速写完成——画面上是日本兵用枪托，殴打一个试图穿过警戒线的中国老人。

一箱写生稿

凌鼎年



那天晚上，米歇尔看到儿子的新画作后，神情变得异常严肃：“特伦布莱，以后不要画这些了。”

“为什么？”男孩不解地问，“伯顿先生说画家应该记录真实。”

“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米歇尔揉着太阳穴。

伯顿先生在一周后离开了天津。临行前，他送给特伦布莱一盒高级炭笔和几本空白速写本。

“记住，真正的艺术永远跟人性站在一起。”他意味深长地说。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天津，整个城市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米歇尔禁止特伦布莱独自外出，但这阻挡不了男孩的画笔。他爬上教堂的钟楼，用望远镜观察远处的街道，然后把看到的景象画下来——日本兵在街头设立检查站、中国平民被迫向日军鞠躬、商店被洗劫……

1937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特伦布莱目睹了永生难忘的一幕。透过望远镜，他看到一队日本兵押解着十几个被捆绑的中国军人来到河边空地。没有审判，没有解释，日本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步枪……

枪声响起时，特伦布莱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但他强迫自己继续画下去。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必须记录下这一切。速写本上很快布满了倒下的躯体、喷溅的鲜血以及狞笑的日本兵。

那天晚上，米歇尔发现了儿子的新作品。他一张张翻看，手开始不住地颤抖。

“爸爸，他们为什么这样没有人性？那是生命啊。”特伦布莱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米歇尔抱住儿子，不知如何回答。作为传教士，他相信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作为医生，他救治过许多日本伤兵；但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种残酷。

“特伦布莱，我要送你回加拿大！”米歇尔最终决定道。

“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留在天津！我喜欢这里……”男孩乞求着。

米歇尔指着那些画作：“这些很重要，比你想的要重要得多。它们需要被世界看到，但在这里，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

1938年春天，十岁的特伦布莱带着他所有的画作——几大本速写和数百张单幅素描，登上了艘英国商船。临行前，米歇尔把画作精心装在一个牛皮箱里，叮嘱道：“保护好它们，等到安全的时候，让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特伦布莱哭着答应了。他不知道这竟是他与父亲的永别。

(三)

船在海上航行了六个星期。特伦布莱大部分

时间都待在舱房里，翻看自己的画作，添加细节和注释。有些画面太过残酷，有些则让他久久凝视。

抵达温哥华后，特伦布莱被姑妈格丽特接走。格丽特是个严肃的小学教师，对哥哥送回来的这个艺术神童，既困惑，又担忧。她把特伦布莱安排在自己多伦多家中的小卧室里，而那箱画作则被塞进了阁楼。

“等你长大了再处理它们。现在你需要适应加拿大的生活。”格丽特说。

特伦布莱尝试着融入新环境，但他总是在梦中回到天津——教堂的钟声、海河上的船只、街边的饺子，还有父亲在诊所里忙碌的身影。1939年，噩耗传来：米歇尔·麦肯锡在救助中国伤兵时被流弹击中，伤重不治。

十二岁的特伦布莱在得知消息后，整整三天没有说话。第四天早晨，他爬上阁楼，打开那只皮箱，开始整理画作。他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让世界知道天津发生了什么。

1945年，二战结束，十八岁的特伦布莱已经是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他重新检视那些当年在天津画的速写，开始根据记忆为一些画面添加色彩。教授们对他的作品既惊叹又忧虑。

“这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可能引起外交风波。加拿大政府恐怕不会同意。”他的导师克莱门特说。

特伦布莱不为所动。1946年春天，他联系了几家报社，希望发表部分画作。《多伦多明星报》表现出兴趣，约定几天后与他面谈。

一个周日晚上，特伦布莱最后一次整理画作，他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三十幅，准备转天带给编辑，其中有日军处决战俘的系列，有街头暴行的场景，也有普通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是他最珍视的，因为它们记录了那座城市本来的面貌。

周一早晨，特伦布莱抱着画作走出家门。天空下着小雨，他决定坐电车去报社。在穿过皇后街时，一辆失控的卡车突然冲上人行道……

当格丽特赶到医院时，医生告诉她，特伦布莱当场死亡。医生说：“很遗憾，他手里的那些画大部分被雨水和血水毁了。”

痛苦的格丽特把剩下的画作和那只皮箱一起，重新锁进了阁楼。随着岁月流逝，这个悲伤的故事被家族渐渐遗忘。

(四)

2018年12月，杰森·麦肯锡在整理多伦多老宅的阁楼时，发现了一只尘封的皮箱。作为特伦布莱哥哥的孙子，他对这位早逝的叔祖父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

皮箱里整齐排列着几十本速写本和数百张单幅素描。杰森随意翻开一本，顿时惊呆了——画面上是日军屠杀平民的场景，笔触虽然稚嫩但充满力量，右下角工整地写着“Tremblay McChesney, Tianjin, 1937.12.14.”

接下来的几天，杰森仔细检查了所有画作。除了战争暴行，还有许多上世纪30年代天津的城市风貌和市民生活的珍贵记录。他联系了多伦多大学的历史教授，确认了这些画作的史料价值。

“这些应该回到中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教授激动地说。

2024年1月，杰森带着那只皮箱飞往天津。在档案馆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邀请来辨认画中场景，当她看到一幅卖糖葫芦的小贩速写时，突然泪流满面。

“这是老李头，日本人把他打死了，就因为他拒绝给日本兵鞠躬……”她用颤抖的手指着画说。

工作人员郑重地接过皮箱：“这些画作将作为永久馆藏。它们不仅记录了日军暴行，也记录了天津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坚忍精神。”特伦布莱·麦肯锡先生用他的画笔，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

当天晚上，杰森站在海河边，看着对岸灯火通明的现代化高楼。他想起了叔祖父画中破旧但充满生气的旧天津，突然明白了艺术的力量——它能穿越时间，让记忆永不褪色。

而9月成立的天台山抗日游击队、杨山抗日游击队、柳林河抗日游击队、黄大寨抗日游击队等，都同仇敌忾，奋战在红安的每一座山头、每一块田地、每一处密林……游击队虽然装备落后，但队员们一个个奋勇争先，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广大村民积极支援，一个人倒下去，就有另一个人顶上；一家人牺牲了，就有一村人站到一线……听老人们说，不只是青壮

年抗日，就连当年的红安妇女也不甘示弱，她们组成了慰问队，为自卫队缝补衣服、筹集粮食、赶制棉衣。寒冬腊月，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却仍然不停地忙碌着。当她们将一件件厚实的棉衣，送到自卫队员手中时，队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最让游击队感动的是红安的的孩子们，他们组成了儿童团，为自卫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

正是因为军民同心、国共合力，进入红安的日本人没有吃到好果子。游击队与国民革命军协同，打了一场场漂亮的硬仗。

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出动六架飞机轰炸七里坪，安北自卫队队长石世金不惧生死，于古峰岭仰面机枪击落日机一架，击毙驾驶员二人，缴获机枪两挺，并将日机烧毁，极大地振奋了大家的抗日信心。

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千余人犯七里坪，国民革命军第171师二团在第三区自卫大队、鄂东游击队有十三支，共四百余人，如1938年8月最早建立的永河游击队，有枪十五条，共二十余人；

老人们常说，故乡红安的山是有记忆的。红安，原名黄安，这座镶嵌在鄂东北大别山麓的小城，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将军县”。

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故乡红安就像一块肥沃的红色之地，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都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创始地。

提起大别山，人们的视线总是最先去寻找地图上的一块弹丸之地——湖北省红安县（黄安县）。作为黄麻起义的策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红安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提及：1927年11月13日，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在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于长汀北地区首次举行武装起义，一举攻克了黄安城，成立了黄安县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此前这里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2年11月29日，这里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

红军从江西、鄂豫皖边区等各自根据地走上长征路时，五支红军部队在红安成立、重建和改编的初期，平均每三名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红安人；每牺牲的一名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红安人。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参加红军的三万多优秀儿女中，新中国成立后尚存的仅有六百余人。除国民党屠杀之外，红安人民不能忘记的，还有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牺牲的军民。

1938年深秋，当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长江流域的宁静，这座孕育了无数革命火种的县城，注定要在烽火中经历一场血与火的淬炼。

据《黄安县志》记载，日本人是1938年10月27日下午踏入黄安这块土地的。当天日军龙川香受二师团的三个陆战队和冈村师团团野炮队的三千余人，在中井指挥下，沿宋埠、河口公路线侵入

烽火中的不屈脊梁

李骏



年抗日，就连当年的红安妇女也不甘示弱，她们组成了慰问队，为自卫队缝补衣服、筹集粮食、赶制棉衣。寒冬腊月，她们的手冻得通红，却仍然不停地忙碌着。当她们将一件件厚实的棉衣，送到自卫队员手中时，队员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最让游击队感动的是红安的的孩子们，他们组成了儿童团，为自卫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

正是因为军民同心、国共合力，进入红安的日本人没有吃到好果子。游击队与国民革命军协同，打了一场场漂亮的硬仗。

1939年1月，日本侵略军出动六架飞机轰炸七里坪，安北自卫队队长石世金不惧生死，于古峰岭仰面机枪击落日机一架，击毙驾驶员二人，缴获机枪两挺，并将日机烧毁，极大地振奋了大家的抗日信心。

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千余人犯七里坪，国民革命军第171师二团在第三区自卫大队、鄂东游击队有十三支，共四百余人，如1938年8月最早建立的永河游击队，有枪十五条，共二十余人；

老人们常说，故乡红安的山是有记忆的。红安，原名黄安，这座镶嵌在鄂东北大别山麓的小城，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将军县”。

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故乡红安就像一块肥沃的红色之地，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都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曾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是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创始地。

海兽衔悲

海河浮动着碎金般的晨光，水汽漫过老龙头火车站铸铁穹顶的青苔，浸润了估衣街的青石板。苏默斋推开“守拙斋”的枣木门板，铜铃轻响，惊起檐角灰鸽。展柜深处，那面唐代海兽葡萄铜镜卧于绛紫丝绒上，狻猊镜钮怒目圆睁，缠枝镜缘如浪翻卷。指尖拂过冰凉的镜背，祖父临终前的嘶喊骤然穿透二十年光阴：“庚子年洋炮炸塌三条石！咱家铜铺只剩这箱铜瓷刀……器皿即国脉，护器如护国啊！”

“苏掌柜，这海兽镜可是唐天宝年间的宝器！”裱画匠杨老槐捧着铜镜，枯指点向葡萄纹深处，“您瞧这葡萄粒儿凸鼓得活泛，海兽鬃毛根根带劲，搁咱天津卫独一份儿！”

他忽然压低声音：“海光寺兵营的山田少佐正满城搜罗古物献媚天皇，连玉皇阁的铜钟都卸了……”

话音未落，马蹄踏地声如冰雹砸门。日军少佐山田正雄持军刀闯入，皮靴碾过门槛带进半片枯黄的法国梧桐叶——那是英租界被炮弹削秃的残骸。他目光如毒蛇缠上铜镜：“昭和圣年需要唐镜彰显